

[德]诺贝尔·埃利亚斯 著

[德]米歇尔·史洛德 编

吕爱华 译

林瑞 校订、导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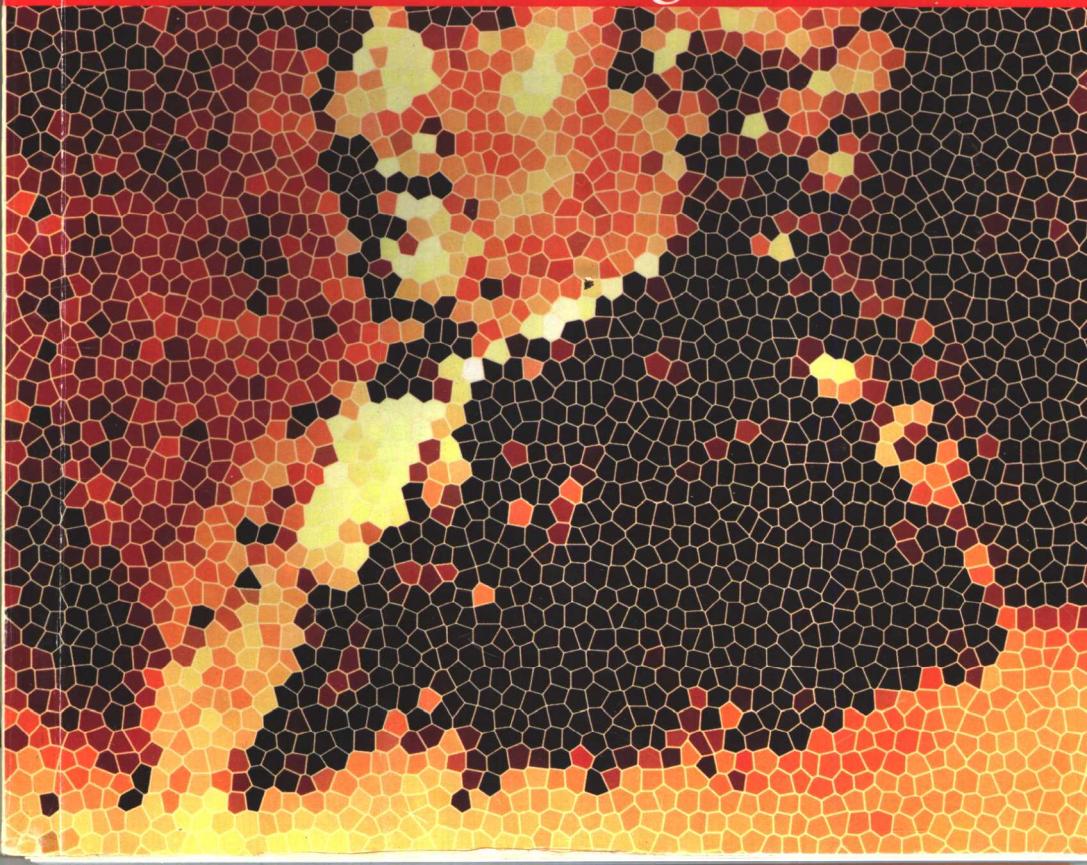
一部音乐社会学的名作

洞察莫扎特介乎天才与小丑间的悲欣人生

深入社会学大师埃利亚斯广阔的思想世界

# 社会学视野下的音乐天才 莫扎特的成败

## Mozart: Zur Soziologie eines Genies



社会学视野下的音乐天才  
**莫扎特的成败**

Mozart: Zur Soziologie eines Genies

[德]诺贝尔·埃利亚斯 著

[德]米歇尔·史洛德 编

吕爱华 译

林瑞 校订、导读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桂林·

**MOZART: ZUR SOZIOLOGIE EINES GENIES by Norbert Elias**

Copyright: © 1991 by the Norbert Elias Stichting, Amsterdam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06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译文由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提供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20 - 2006 - 031 号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莫扎特的成败:社会学视野下的音乐天才/(德)埃利亚斯著  
米歇尔·史洛德编;吕爱华译.一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11

(音乐馆)

ISBN 7 - 5633 - 6303 - 3

I . 莫… II . ①埃… ②史… ③吕… III . 人才社会学 - 研究 IV . C96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93528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 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541001 }  
网址 : [www.bbtpress.com](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肖启明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发行热线:010 - 64284815

山东人民印刷厂印刷

(山东省泰安市灵山大街东首 邮政编码:271000)

开本:880mm×1 230mm 1/32

印张:6.5 字数:135 千字

2006 年 1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 001 ~ 6 000 定价:20.00 元

---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诺贝尔·埃利亚斯** (Norbert Elias) 犹太裔社会学家, 1897年出生于德国布里斯劳 (即现在波兰的弗劳茨瓦夫), 1990年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去世。他是贯穿古典社会学与当代社会学的关键人物, 一生致力于“人的科学”的研究, 试图整合社会学、心理学、历史学等学科, 并以“形态社会学”来整合微观社会学与宏观社会学, “心理发生”层次与“社会发生层次”的问题。这位百科全书型的大师, 一生著作颇丰, 除本书外, 主要著作还有《文明的进程》(上下册)、《宫廷社会》、《个体的社会》、《圈内人与圈外人》、《德国人研究》、《什么是社会学?》与《知识社会学论文集》(上下册)等, 此外还留有众多手稿。2005年, 19册的全集由Suhrkamp出版社出版。

**琴恋 钢琴夫人史兰倩斯卡青春回忆录**  
[美]露丝·史兰倩丝卡 路易·毕昂柯里 著

**指尖下的音乐**  
[美]露丝·史兰倩丝卡 著

►  
**默观无限美 西洋古典音乐讲座**  
刘岠渭 著

**莫扎特的成败 社会学视野下的音乐天才**  
[德]诺贝特·埃利亚斯 著

责任编辑 周彬  
装帧设计 伊大伟 张今亮  
内文排版 杨无惧  
<http://www.bbtbook.com>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www.ertongbook.com](http://www.ertongbook.com)

# 导 读

## 埃利亚斯和他的莫扎特

林 端

(台湾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 一、埃利亚斯其人其事

当社会学家碰到音乐家,会碰撞出什么火花呢?当犹太裔的社会学家倾听日耳曼音乐家的音乐,会是什么光景?

且来看看这本社会学大师写音乐大师的奇书:长寿却饱受流离之苦的埃利亚斯(Nobert Elias, 1897—1990),用社会学来研究短寿却享尽身后盛名的莫扎特(Wolfgang Amadeus Mozart, 1756—1791)。

广义来讲,这是一本有关音乐家、有关天才的研究,是音乐社会学与文化社会学的重要作品。在这部作品中,埃利亚斯首尾一贯地强调,天才并非如大家所想像的那样是与生俱来的,相反,天才必须在一定的社会文化脉络中才能成其为天才。换句话说,没有庸才,哪来天才?没有听众,哪来音乐家?没有支撑音乐家的文化背景与社会

关系,天才就无法成就其鹤立鸡群般的卓越成就。这是埃利亚斯形态社会学(Figurationssoziologie)与社会学关系主义(sociological relationalism)研究方法的具体运用,终其一生,他把这样的研究方法应用在各个不同的社会文化领域,由莫扎特到德国人、犹太人,从族群关系到中世纪的刀叉与餐厅礼节的问题。纵横上下论古今,他首尾一贯地进行相当令人佩服的研究工作。我们在此首先要进行的,是就其个人的生命史与学术创作史做一简单回顾,然后看看这位大器晚成的社会学大师,是在什么样的艰苦环境中,一步一步地完成他终生研究的伟大志业。

埃利亚斯,1897年6月22日生于德语区的布里斯劳(Breislau)<sup>(1)</sup>,这在当时位于德国境内,现在则隶属于波兰(当地犹太人之多,仅次于柏林与法兰克福)。他的父母都是犹太人,家道殷实,身为犹太商人家庭的独子,从小过着不愁吃穿的生活,接受普鲁士高度的人文教育。他在舒适的家庭中长大,经过私人教师启蒙之后,就读于家乡著名的约翰尼斯文法中学(Johannes-Gymnasium),在此培养了他的人文素养,优秀的师资让他对于学术研究,尤其是康德以下的哲学,有着浓厚的兴趣。在那个时代里,犹太人非常注意孩子的教育,以为其未来出路作准备。他的父亲当年由于经济的因素,无缘就读大学,便把希望都寄托在他身上,冀望他攻读医学。

德语世界里的犹太人比法语世界的犹太人,处境较为不利。19世纪的马克思(Karl Marx, 1818—1883)终其一生,无法在德国大学谋到任何教职,除了因为他属于左派之外,另一个原因便是其犹太人的身份。当时在出任政府公职与某些视同官方的职位(如教授)方面,犹太人皆受一定的限制。所以埃利亚斯的父母,尽管已相当认同普鲁士文化,但还是很希望孩子能受很好的大学训练,拥有一技之长,以便在一个犹太人被另眼相看的环境中生存下去。埃利亚斯除了本

身喜欢哲学之外，也奉父母之命选择医学作为大学主修的科目，在那个时代里，成为医生的的確确是犹太人极佳的出路之一，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 1856—1939)便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在进入大学之前的1914年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年，年仅18岁的埃利亚斯就被派到西线的战场去当兵，幸好并未战死沙场。1918年21岁，他进入家乡的布里斯劳大学就读，医学的训练使他获得一定程度的自然科学知识，而哲学才是他充满兴趣的学科。然而介于哲学观念论的人性图像，以及医学解剖生理学的人性图像之间，令他产生非常大的困惑：究竟人是一个拥有理性思维能力的“观念人”，抑或是与动物并无太大差别的“生物人”？

德国的大学相当自由，所以他有一两个学期跑到德国西南方的海德堡大学与弗莱堡大学游学。虽然在哲学与医学之间，他最终选择了哲学，但当时新康德主义(Neukantianismus)笼罩下的哲学系，其对人性的看法，以及对人与社会文化的关系，却没有办法满足他个人的想法与观点。

自然科学对于人文学科的挑战，就好像在韦伯 (Max Weber, 1864—1920)身上发生的一样，韦伯解决的策略就是建立自己的理解社会学(*verstehende Soziologie*)，将人文学科的理解(*Verstehen*)研究方法，与自然科学的解释(*Erklären*)研究方法综合起来，希望同时涵盖内在主观的意义与外在客观的经验事实。这种社会学的研究策略对埃利亚斯产生莫大的吸引力，也导致他后来放弃医学与哲学，转而投奔社会学的学术抉择。

为了取得博士学位，埃利亚斯在家乡大学的哲学系里，找到一位新康德主义的老师赫尼希斯瓦尔德 (Richard Hönigswald, 1875—1947)。由于他本身已走向经验主义，而对哲学形而上学的立场保持一定的距离，他与博士论文指导教授间的关系异常紧张，他按己意

写出来的博士论文(题目为“理念与个体”),在指导教授眼里始终是不及格的作品,送上去、退回来、改了又改,最后终于在1924年拿到了哲学的博士学位。当时正值一战后的魏玛时代,毕业后,他的父母因为通货膨胀的关系,希望他逐步自立,于是他在企业里当了两年的行銷主任。

然而对于学术的热情,仍驱使他回到大学。1925年,他转到海德堡大学继续未竟的学术生涯。由于他放弃了哲学家的先验立场而选择经验科学家的立场,在博士论文阶段就与指导教授闹得很不愉快,这注定了没希望进行所谓的教授论文(Habilitation)。因为想要在德语区担任大学教授,除了要拥有博士学位之外,还得撰写第二个博士论文,即所谓教授论文。而他对人性以及对人文社会学科的看法,已然转向接近经验世界的学科观点,因此他转到海德堡,希望在那儿找到能接受他的论文指导教授,一方面师从学习,另一方面也希望能谋个助教之职,让自己的生活有所依靠。

埃利亚斯于1924、1925年间到达海德堡时,韦伯已经去世,但韦伯留下的传统却让海德堡拥有一个充满活力的社会学学圈,韦伯的遗孀依然健在,继续主持其家中非正式的学术讨论会。韦伯的弟弟阿尔弗雷德·韦伯(Alfred Weber, 1868—1958)主导着海德堡大学里社会学的研究工作,当时并没有社会学系,基本上还是在“国民经济学系”(迄今海德堡大学经济系为了纪念韦伯,仍以此为系名)里作社会学研究。另一位重要的社会学大师,则是创立知识社会学的曼海姆(Karl Mannheim, 1893—1947),当时曼海姆尚非教授,但却是已取得教授资格、待价而沽的私人讲师身份(Privatdozent,此身份并非真正无给职的私人讲师,而是已取得教授资格,等待受聘的教授候选人)。在这个富有学术传统的学术社群里,埃利亚斯非常幸运地获得良好的社会学训练,在阿尔弗雷德·韦伯教授与曼海姆私人讲师

这两位大师之间，埃利亚斯选择了一——或者说是获得了曼海姆的青睐；在韦伯那边，埃利亚斯只是第四顺位，前面已有三个人等着作教授论文，然而曼海姆却以他为第一顺位，答应当他的指导教授，只要他担任三年的助理。

曼海姆于 1929 年底才因其杰作《意识形态与乌托邦》(*Ideologie und Utopia*)，获得法兰克福大学的任命，出任社会学正教授，所以埃利亚斯认为跟定这个年轻的指导教授，未来的学术生涯应该也可循序渐进、一步一步往上爬。在海德堡的四五年间，一直到 1929 年底，他同时为阿尔弗雷德·韦伯与曼海姆所接纳，他同时获得韦伯遗孀的邀请，到韦伯家中参与学术讨论。在这个学术氛围中，埃利亚斯确立了自己作为社会学研究者的人生志向。他受到两位大师的庇荫，而这是拥有强大的韦伯传统作为基础的，因为人们都说阿尔弗雷德·韦伯教授处在在他伟大的哥哥的阴影之下。

1930 年，当曼海姆到法兰克福任教时，埃利亚斯也到法兰克福大学担任曼海姆的研究助理。著名的法兰克福学派也刚萌芽，同为犹太后裔的霍克海默 (Max Horkheimer, 1895—1973) 与阿多诺 (Theodor W. Adorno, 1903—1969) 等开创了“社会研究所”，但却从不与曼海姆往来。然而埃利亚斯夹在其中，却受双边垂顾，就像不久前在海德堡一样。他在法兰克福大学，一面做助教，一面进行教授论文的准备工作，论文题目是“宫廷人”(Der höfische Mensch)<sup>[2]</sup>。眼看着教授生涯在望，但好景不常，三年后的 1933 年，纳粹崛起。大难来时各自飞，曼海姆自身难保，一方面他是出生在匈牙利的犹太人，另一方面他是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左派，这两种身份当然都是纳粹最讨厌的，所以曼海姆不得不步上流亡之途。这一棵年轻的大树在德国本土被拔除后，埃利亚斯等门徒顿失学术与生活的倚靠(同样，法兰克福学派霍克海默等人也流亡他国)。1933 年，埃利亚斯逃离德国，就

像他自己经常挂在嘴边的：“教授论文没做完，再念书太老，但去求职当教授，又显得太年轻。”结果，他在瑞士及法国求职的过程中四处碰壁；1935年后他又流亡到英国。其实最悲惨的，还不仅是学术生涯与职业前途被纳粹彻底粉碎，更重要的是他失去了最敬爱的两位亲人。当他逃到伦敦时，其实双亲也曾在1938年逃到当地与他相会，然而两位老人却完全放心不下家乡的产业，心想纳粹再怎么坏，也不至于坏到在对付德国本土的犹太人之后，还去对付波兰地区德语世界的犹太人，于是便天真地回到家乡，最后先后于1940至1941年间死在纳粹的集中营里。

那是一个欧洲犹太人无所遁逃于天地间的时代，埃利亚斯在法国找不到出路，于是转往英国发展。一句英语都不会的他必须重新开始，为了学术与职业前途而苦练英文。在伦敦，曼海姆再也帮不上他的忙了，他虽比埃利亚斯较早逃到英国，但却自身难保。好斗成性的曼海姆在英国的社会学界里自我奋战，最后却在教育系而不是社会学系里找到正教授的职位，因此他对埃利亚斯也就没有再提供任何实质的帮助。事实上在英国求生存，也不需要教授论文，只要有一定的学术研究能力，同时有大学肯聘任，便可学院里工作。然而可想而知，在那个战乱的年代里，一切百废待举，拥有人文社会学科专长者满街都是，而大学职位却是少得可怜，为了生存，埃利亚斯只得前往类似社区大学及训练中心等地方去谋职。

他到工党附设的成人教育中心任教，教授一些社会学课程，然后孜孜不倦地撰写一本又一本的重要著作。1954年，他才受到莱斯特(Leicester)大学社会学系聘任为讲师，这时他已经57岁了(某些他教过的学生早已名列教授之位)。随着其作品逐渐受重视，他变得小有名气。1962年，也就是他65岁时，终于获得教授的聘书，但却不是在欧洲，是非洲的加纳大学给了他两年的教授聘书。1964年，他自加

纳返回欧洲,67岁的他甫回欧洲大陆,家乡已不再是德国,而是荷兰。在荷兰有许多欣赏他的学者,他受邀担任客座教授,最后德语世界也注意到他了,因此得以回到德国,在各大学中担任客座教授。1977年,他以80岁高龄,获得法兰克福颁赠的杰出学术研究奖——阿多诺(Adorno)奖(此奖座之设立乃为纪念前面提到的杰出犹太裔社会学家兼音乐家阿多诺),这是为表扬有重大学术贡献的学者所颁赠的奖励。一个当年被驱逐出德语区的犹太人,终于重回德国,受到积极的肯定,然而德国毕竟是伤心地,所以他于1984年选择了永久定居于阿姆斯特丹;1990年,他以93岁的高龄去世。

埃利亚斯是什么样的人呢?他是犹太人?德国人?英国人?还是荷兰人?在他成名之后,年轻的德国社会学家访问他:“你一生经历过这么坎坷多变的生涯,到底还会不会自认为德国人呢?”显然,这些德国的学术后进满心期待埃利亚斯会自认为是德国社会学家,因为他的主要作品皆以德文写成,何况又直接师承韦伯兄弟与曼海姆的学术研究传统。但是长久身为边缘人(marginal man)的埃利亚斯回答得简洁有力,他说虽然他深受德国文化影响,但他是“在英国生活三十年的德国犹太人”。其实,他是一位类似世界公民的人,这是他的身份,也是他的角色,他不专属于哪个国家。一生的坎坷并未将他击倒,他著作等身,而且面对人类文明的发展,带着一定程度的乐观,令人不得不佩服其执著于学术研究的毅力与决心,还有那旺盛且持续不断的求生能力。不管多艰苦的环境,多寂寞而孤单的生活方式,都没有将他击倒。他以惊人的毅力与决心跨越了两次世界大战,横跨古典到当代的社会学思潮,最后卓然成家,自创一派。如今在荷兰、英国与德国等地,都有埃利亚斯学派的门徒在那里持续努力地进行学术研究。

坎坷多变的一生,造就了埃利亚斯的大师风范,以其社会学大

师的身份来描绘 18 世纪西方的音乐天才——莫扎特的一生，大师书写大师，精彩自是可期。以下我会先介绍埃利亚斯的社会学研究方法及其重要的作品，接着再谈谈这本书的主要内容，然后再将本书放在埃利亚斯的学术创作脉络中，探讨其与作者本人，以及与其他作品之间密切相关的特性。讨论完这些，我们将会发现，这部作品绝非一部孤立的作品。相反，埃利亚斯在这本书中，首尾一贯地展现其社会学研究的特色，而本书则与他的其他作品，既密切相关又相互辉映。

## 二、埃利亚斯的社会学理论

要理解埃利亚斯的社会学理论<sup>[3]</sup>，必须先谈谈他的某些关键概念，首先是“形态”(Figuration)的概念，这是他自己独创的概念，通过这个概念，他整合了微观社会学与宏观社会学的研究方法，亦即整合了“行动论”与“结构论”这两个不同的研究方法。韦伯强调社会学的基本研究对象是人的“社会行动”(soziales Handeln)，也就是所谓一切社会学的分析，都必须从个人的行动主观、客观的意义出发，亦即从微观的社会学立场来进行社会学分析。对于这样的传统，曾经身受海德堡大学韦伯学术传统熏陶的他，自是耳熟能详。同样，法国犹太裔的社会学家涂尔干(Emile Durkheim, 1858—1917)则从宏观社会学出发，强调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是独立于个人而存在的“社会事实”(social fact)，社会制度与结构都必须从这些宏观的视角来加以掌握。此一两极化的社会学分析方式，要么是个人行动，要么是社会结构，再不然是微观世界或者宏观世界，对埃利亚斯来说，如何克服、化消这种方法论上不必要的二元对立，是他本身社会学理论以及社会学研究方法所要展现的特色。在这种前提下，他建构了“形

态”这个概念。

他强调一个人基本上作为一个社会性的存在(social being),是没办法靠生物的本能来过日子的,因此,必须在一个社会脉络中,在跟别人的共同相处与生存的状况下成长。换言之,人是一个社会性的存在,在人的群体里,在人所建构的象征世界里,彼此之间拥有共通的语言、共通的象征、共通的知识与生活方式。在这种状况下,人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人,所以人是存活在与别人相互倚赖的“形态”里,在那里成长为一个人,一方面社会化,一方面个体化;我们跟别人在一起,一方面成为社会里面的一分子,另一方面也因为别人的衬托而使本身的个体性呈现出来。

所以,共同生活、相互倚赖,既相同又相异,这些是同时发生的事,人的群体性不可能脱离个体性而存在,人的个体性也不可能脱离群体性而存在;个体与群体、个人与社会,并非相互独立而是并存共生的概念。个人也是跟其他的人在特定的“形态”里成长的,没有他人就没有自我,就好像人称代词里,“我”预设着“你”跟“他”的存在,“我们”也是预设着“你们”跟“他们”的存在,“男性”预设着“女性”的存在,或者社会角色里,“丈夫”的角色预设着“妻子”的存在,“父母”的角色预设着“子女”角色的存在,所有这些不只在概念上相辅相成,而且在实际的社会生活中,也是生活在不同的“形态”当中。

“形态社会学”所要强调的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倚赖,它所强调的既非微观社会学的社会行动论,亦非宏观社会学的社会结构论,前者我们常称为“方法论上的个体主义”(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后者则常被称为“方法论的集体主义”(methodological collectivism),而埃利亚斯为了突破这种二元对立,则强调一种“方法论的关系主义”(methodological relationalism),意思是说:人是一种社会关系的存在,我们不能过度强调其个体性,也不能过度强调其群体性

或社会性，因为人的群体性与个体性都在人的关系性中得以确保，“我们”是跟“你们”、“他们”在一起的，正如“自我”与“他人”息息相关。不仅在概念的世界里，各种代词与概念构成一种“形态”的关系，其所对应的社会生活中之所有人际关系，也都构成不同层次的形态关系：“方法论的关系主义”所要研究的就是人相互倚赖的形态，既非偏重独立的个人，也非偏重一个过度压抑个人的社会；相反，人生活在各种社会形态中，一方面被社会影响与制约，另一方面则在各种形态的关系脉络中，在与别人相互倚赖的各种形态中发展自我。

一言以蔽之，埃利亚斯的社会学研究就是对社会中各种不同“形态”的研究，这本讨论莫扎特音乐天才的小书，在研究方法上也不例外。他是把“形态社会学”与“方法论的关系主义”应用在音乐天才跟他的家人、其所处的萨尔茨堡与维也纳的宫廷社会，甚至欧洲的宫廷社会之间的“形态”关系。没有庸才，哪来天才？没有听众，哪来音乐家？音乐家跟他所处的家庭、社会等不同类型的“形态”息息相关，纵然“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哪得几回闻”是一个音乐天才的极致表现，但若没有足够的社会关系支撑，没有稳定的形态结构支持，一代天才也难逃英年早逝、郁郁以终的命运。换句话说，音乐的卓越性或者天才的超凡特性，正因为有凡间庸庸碌碌的听众支持，才可能成其神圣性与卓越性；一旦有一天，当他走到人家听不懂的境界里，他的听众不再支持他的时候，也就是悲剧性的开始。

就这一点，埃利亚斯反对如韦伯的卡理斯玛(Charisma)概念所体现的个体性能力，因为他认为韦伯强调的是个体性的、与生俱来的神秘力量，不管别人承不承认，这种力量是天赋的神奇力量；埃利亚斯反对这种概念，认为没有群体的关系脉络的支撑，此一概念毫无意义。1964年，埃利亚斯重返德国，在海德堡出席纪念韦伯百年诞辰的社会学大会，就曾发表论文，对此种过度个体化的概念提出批

判<sup>14</sup>。所以在本书里,他就是把形态社会学与“方法论的关系主义”应用到音乐家社会学、艺术社会学与天才社会学的分析之上。

其次,我们要注意埃利亚斯对“文明”与“社会进程”的重视。换句话说,社会学家不应该把前面谈到的形态与关系主义看成是一个静态的、共时性的(synchronic)现象;相反的,社会学家不能回避历史,必须注意到社会变迁与社会发展的、贯时性的(diachronic)历史演变的社会进程。对他来讲,西方社会文明化的社会进程是一个穷毕生精力所必须研究的重要课题,他的两大册成名作《文明的进程》<sup>15</sup>,副标题是“文明的社会发生与心理发生的研究”,上册谈的是西方国家世俗的上层社会的行为变化,下册则论述社会的变迁与文明理论的大纲。我们要说明的是,不仅仅是这两本书,事实上在其他众多研究中,他都一样既重视“共时性”的社会形态,也重视“贯时性”历史变迁的重要性。这方面他继承了韦伯从历史主义沿袭下来的社会学研究传统,人是一个社会脉络的存在,但人也是一个历史性的存在,广义的社会学研究必须包含历史研究,对于共时性的问题与贯时性的问题,彼此之间皆不可偏废。

换句话说,“形态社会学”也必须注意到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各种社会关系的变化,由个体到群体,由个人到国家,都包含在一个社会进程的演变里。他强调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有起有落,有人正在起高楼,也同时有人在塌陷的楼房中,潮起潮落、上楼下楼,皆是社会进程的常态。他认为和生物性的进化不同的是:社会进程有可能朝相反方向发展,有的社会阶层往上爬,有的社会阶层往下掉落,但没有人能永远坐庄;朝为天子臣,暮为阶下囚,得意时可以决定生杀大权的上位者,失意时有可能任人宰割。下阶层的人也可能有翻身的一日,没有人是永远的贵族,也没有人是永远的穷人。这是他对西方社会文明发展的观照,在宏观的社会结构如此,在微观的个体世界

里面亦复如是。

因此,他强调社会学某些一组一组的概念,譬如说整合/解组、聚合/距离化、文明/去文明,以及上升流动/下降流动,这都是社会进程里经常发生的。长时间的社会进程就会牵涉所谓的权力分配问题。以工业化过程来说,这代表工业机器生产与工业工作形态的上升,反之,则是手工业生产方式与手工业群体的下降;在第二波工业化过程里,则是计算机化、自动化,以及相关工程师阶层的上升,这同时也意味着在它先前的工厂劳动与服务业的形态,与其相关阶层的下降。这种上升与下降是一种长期的发展过程,我们在人类共时性与贯时性的社会结构里,也会看到此种权力关系的改变,一个在低阶层往上流动,取代了原来上阶层人士的社会位置,迫使他们向下流动。他以欧洲文艺复兴时代为例,发现天主教神职人员的阶层与世俗的封建主之间的关系,还有封建贵族与封建诸侯的关系,都是后者取代前者,而这种发展过程必须通过长时间的分析与理解。基本上,他认定这些发展是非计划性的社会进程,并不是像拿破仑或恺撒大帝这种帝王将相所能单独加以推动的;相反,它是长期社会演变的过程,社会学家必须通过长期的分析与研究,才能够确切地加以掌握。

### 三、埃利亚斯与弗洛伊德的异同

这里我们要先谈谈,弗洛伊德对埃利亚斯的文明发展之社会进程理论所产生的影响<sup>10</sup>。弗洛伊德作为一位精神科医师与心理分析专家,基本上是从个体心理学出发的,他构建了两个概念,一是“心理发生”(Psychogenese),另一是“社会发生”(Soziogenese)。对他来讲,人类社会的发生进程与人在家庭中的心理发生进程相类似,所以小